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雁行理論與日本的東亞經驗

The Flying Geese Theory and Japan's East Asian Experience

doi:10.30390/ISC.200401_43(1).0001

問題與研究, 43(1), 2004

Issues & Studies, 43(1), 2004

作者/Author：王佳煌(Chia-Huang Wang)

頁數/Page：1-3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4/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1_43\(1\).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1_43(1).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雁行理論與日本的東亞經驗*

王 佳 煌

(元智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 要

許多理論都曾被用於研究東亞的發展經驗。國家中心論、文化詮釋與社會關係網絡分析都是其中華章大者，學者亦偶爾提及雁行理論。然而，雁行理論一直沒有得到完整的認識與理解，以致相關研究不是各說各話，就是明顯不足。國外對雁行理論的研究雖未如其他理論典範那麼盛行，二十年來卻也不絕如縷。只是支持者與批評者認知的理論圖像不同，以致爭論缺乏明顯的交集。另一方面，國內對雁行理論的認識與研究始終貧乏，對國外的論戰似乎亦漠不關心。部分人士甚至望文生義，動輒斷定雁行理論已經破產，不足以解釋東亞發展經驗，經濟學者的研究又多半停留在貿易結構的分析上，忽略雁行理論的其他論題，僅有少數專注於台商 FDI 與產業分工。有鑑於此，本文擬論述國外支持、批評雁行理論的研究，勾勒較完整的雁行理論，並探討雁行理論如何以及能否解釋東亞發展經驗。

本論文第一部分述明撰文意旨，提出分析性問題，第二部分介紹支持、批評雁行理論的論述與研究，第三部分簡要描述雁行理論的原初論題與當代雁行理論的架構，第四部分探討雁行理論與東亞金融危機的關係，特別是雁行模式是否造成東亞金融危機，以及金融危機是否瓦解雁行模式。第五部分為結論。

關鍵詞：雁行理論、外人直接投資、顯示性比較優勢、官方開發援助、東亞金融危機

* * *

壹、導 言

從二次大戰結束到世紀末金融危機之前，日本與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快速經濟成長一直受到政治經濟學家的注意，這些國家或經濟體在連續兩次石油危機之間雖曾遭遇困難，卻始終呈現低失業率與高成長率的印象。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經濟長期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計畫編號為 91-2412-H-155-001-，特此致謝。

停滯，失業率升高，金融危機席捲南韓、泰國等東亞與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東亞經驗及其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才遭到質疑。

儘管如此，東亞與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突出的經濟成就，已引發政治經濟學者與文化學者提出各種理論，企圖尋求合理的解釋，萃取可行的發展策略，以供其他開發中國家參考借鏡。這些理論與研究也曾各領風騷，形成一時流行的典範，最著名的包括文化詮釋、國家中心論、社會網絡關係分析、廣義的依賴理論（尤其是世界體系理論）。①文化詮釋受到韋伯新教倫理論題的影響，多少意在為儒家倫理翻案，企圖論證儒家倫理不一定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甚至可能是日本與東亞新興工業國家戰後快速發展、累積資本的助力。②當然，文化因素的貢獻或阻礙必須審慎評斷。③國家中心論者認定國家適度干預市場，指揮、協調資源的分配，避免資源的錯置與浪費。④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他們是半邊陲國家，依附美國霸權與日本經濟勢力等核心國家而興起。⑤不管這些理論詮釋東亞經濟發展的優缺點為何，起碼論者大致上都明瞭相關理論的輪廓與意旨，鮮有強烈的誤解與錯覺。然而，在日本與東亞經驗的解釋上，雁行理論卻深受誤解。⑥歐美政治經濟學者的論戰不絕如縷，但正反兩方認知、瞭解的雁行理論卻各有其形，以致論戰不易找到交集。相對地，雁行理論在台灣政治經濟學界幾乎沒有經歷過大規模的論戰，許多論者未經深究，眼看中國大陸崛起，驚見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即急忙宣佈雁行理

註① 羅金義、王章偉編，*奇跡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一書收錄蘇耀昌與趙永佳、龐建國之論文有詳細的整理。另外，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民國86年）也有完整的論析。

註②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2).

註③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pp. 12~23.

註④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註⑤ Alvin So and Stephen W. K. Chiu,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5).

註⑥ 雁行理論 (flying geese theory) 其實是一種習慣性稱呼，也有人稱為雁行論題 (flying thesis) 或雁行模型 (flying geese model)。究竟哪一種稱呼較為妥當，要看論者對理論、模型與論題的定義是什麼而定。一般而言，理論是一組命題或假設的組合，各命題或假設之間具有某種邏輯推演或數理關係。但理論也可以說是幾個概念之間關係的論述。模型可以說是對現實具體而微的描述與呈現，也可以說是一組關係的圖形呈現。論題則是大略勾勒兩個現象或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如韋伯對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興起之關係的論述。如果理論的意義重在預測，那麼嚴格的說，雁行理論可能不能稱為理論，因為它只是推論雁群之間此消彼長，既競爭又互補的關係，它並未也不能預測哪一個國家何時一定會超越雁首或何時一定會落到雁群後端。但若理論包括觀察、分析與推論，則雁行理論當可稱之為一種「理論」。不過，要稱為雁行模型，也未嘗不可，這要看個人喜好與習慣而定。

論的死訊。

面對這種現象，我們不妨思考幾個問題：爲什麼雁行理論在台灣知名度不低，卻少有學者認真瞭解其所言何物，或者缺乏起碼的共識？^⑦中國大陸的興起，真的否定雁行理論，打亂雁行模式嗎？中國真的趕上日本或威脅到日本的領先優勢嗎？雁行模式與理論是否因東亞世紀末金融危機而瓦解崩潰？雁行模式要爲東亞金融危機負責嗎？到底雁行理論的論旨與內容是什麼？國外正反兩方對雁行理論的認知，以及支持與反對的論證爲何？

貳、雁行理論：支持者與反對者

一、支持者

支持雁行理論的學者與研究機構包括 Hill、Fujita、野村總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RI）、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亞太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以及澳洲學者 Das。

Hill 及 Fujita 長期研究日商跨國企業在東南亞的投資與區域分工，對雁行理論與經驗研究用力甚深。他們認爲，Cumings 的世界體系理論、Bello 的依賴理論、Amsden 的國家理論、Moon 的區域競爭論雖能論析東亞區域的政治經濟結構，但這些研究與論證各有其偏，不是只重外在或負面因素（Cumings 與 Bello），就是只看國家機關（如 Amsden）。比較起來，雁行理論的解釋比較完善。^⑧他們的經驗研究也證實雁行模式的存在，包括大阪的區域鏈結、松下在東南亞的彈性分工與區域生產網絡，以及日本汽車製造商在東南亞的投資與生產，都呈現出互補的區域分工與趕超的產品生命週期。^⑨

註^⑦ 朱雲鵬、吳進泰是國內少數專研雁行理論的學者，但他們的認知與國外學者、筆者的瞭解有所出入，比較偏向從 RCA 值探討產業結構的轉變，比較少討論 FDI、不對稱貿易結構、區域生產網絡、發展型國家區域化等當代雁行理論的成分。朱雲鵬也曾與幾位經濟學家合寫研討會論文，以 GTAP 資料檢視東亞國家與雁行理論，見朱雲鵬等，「關於雁行理論的一個檢視：GTAP 資料應用於東亞貿易與產業結構變遷之研究」，台灣經濟學會年會學術研討會，台灣經濟學會，1999 年 12 月 19 日。另外，陳添枝（Chen Tain-Jy）也做過一系列台商 FDI 與台商產業分工的研究，成果以英文發表，包括兩篇論文與一篇專書論文，可供探討台商在雁行模式中的表現，詳細資料請查閱國科會網站，另請參閱陳添枝、顧瑩華，「臺灣中小企業海外投資的特徵」，經濟前瞻，第 10 卷第 4 期（民國 84 年 7 月），頁 26～30。

註^⑧ Richard C. Hill and Kuniko Fujita, "Flying Geese, Swarming Sparrows or Preying Hawks?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Change—The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3 (March 1996), pp. 285～97.

註^⑨ Richard Child Hill and Kuniko Fujita, "Economic Governance & Flexible Production: Matsushita in Sou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Economic Governance & Flexible Production in East Asia, October 4-6, 1996); Kuniko Fujita and Richard Child Hill, "Auto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3, No. 3 (March 1997), pp. 312～333.

野村肯定雁行模式的存在，但各研究員對雁行模式的認知似乎並不一致。Kwan的瞭解集焦於日本與東亞各國的貿易互依，^⑩但他後來與其他研究員編著的書又把日商電子產業的海外投資與生產策略視為雁行模式的核心。^⑪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在一九九五年的《全球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連結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來源國與目的國的產業結構轉換與升級，肯定FDI傳輸各種資產(資本與技術等)的作用。^⑫相對地，亞太經濟社會理事會卻把焦點放在亞洲的國際貿易上。他們指出，從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五年，日本自東亞、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進口製造業產品的數量與金額日增，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對日出口產品的技術層級也逐漸提昇。^⑬澳洲學者Das則集其大成，把FDI模式、貿易結構、日商跨國生產網絡與日本援外政策與策略結合起來，描繪比較完整的雁行理論與模式，甚至還將澳洲與紐西蘭納入雁行編隊。^⑭Sikorski與Menkhoff也同意雁行理論有其說服力，但認為它只能說明一九八七到一九九六年的現實，之後的金融危機就非雁行理論所能解釋。^⑮

二、批評者

批評雁行理論的人士通常強調雁行模式的結構性依賴及其負面影響。Bernard及Ravenhill認為，雁行理論只看工業化與區域分工，太過簡化，無法分析東亞複雜的政治經濟結構與動態。雁行理論也像是一種意識型態，避談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依賴日本資金與技術，以及貿易逆差的事實。^⑯Hatch與Yamamura批評雁行模式無助東亞、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只是利用他們的資源，協助日商的發展，更不願意轉移技術，改善日本與各國之間的貿易逆差。這些新興工業國家的產業發展因此無法自主，陷入日本纏繞式發展(embraced development)的結構當中。^⑰他們隨後做的追蹤調查發現：這種纏繞式發展的依賴結構並無根本的轉變，技術依賴、貿易逆差、阻止新

註⑩ C. H. Kwa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Towards a Yen Blo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81~98.

註⑪ Kiyohiko Fukushima and C. H. Kw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Asia," in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s., *The New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pp. 3~39.

註⑫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1995), pp. 239~258.

註⑬ ESCAP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the United Nations, 1997), pp. 91~92.

註⑭ Dilip K. Das,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6), pp. 131~190.

註⑮ Douglas Sikorski and Thomas Menkhof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Asian Business,"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Vol. 22, No.1 (2000), p. 15.

註⑯ Mitchell Bernard and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No. 47 (January 1995), pp. 171~209.

註⑰ Walter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興工業國家迎頭趕上的行事習慣並未改變。^⑩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亦無二致，他們認為雁行理論是一種依賴發展，技術依賴、新帝國主義式的區域分工、壓迫勞工等，都是雁行模式的特色。^⑪ Tsui-Auch 指出，雁行理論主要缺點是高估日本企業在大東亞區域的發展角色，同時低估美商、華僑企業，以及美國廣大市場對東亞各國經濟的貢獻。比起雁行理論、依賴理論、商品鏈理論，區域發展論觀點（regional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更能掌握區域內各國資金、貿易、技術的交流傳輸。^⑫

綜上所述，可知各家論者，不論是批評還是支持，認知的雁行理論與模式各有其偏重之處。有的著重 FDI，有的偏重貿易結構，有的只看區域分工，有的納入援外，有的嫌它解釋、描述的變項太少。整場辯論猶如瞎子摸象，各說各話，缺乏交集。儘管如此，至少國外學者的辯論還知道雁行理論的原創者是赤松要，至少還知道雁行理論與模式的研究應該集焦於何處。反觀國內，談雁行理論的學者多，真正瞭解或能夠有同情理解的卻不多見。真正在做相關研究的，認知的雁行理論不是貿易結構顯現的產業轉換，^⑬就是國家主導經濟發展、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並斷言雁行理論因中國大陸崛起、東亞金融危機、日本經濟衰退而破產，雁行模式不再成形。^⑭國外相關論辯的文獻不多，也不難瞭解，國內卻連這場遠方的烽火都不太注意，即評斷雁行理論得失，似乎失之草率。例如，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在其台灣主張著作中指出：

……大家還認為亞洲經濟是以「雁行姿態」在發展……由日本領航，其他國家像成群的雁鳥追隨其後，逐步發展。……這個有秩序的發展型態已無法維繫。……因為一九八五年「普拉查協議」以降，日圓急遽升值，加上中國大陸在一九九四年採取人民幣貶值的策略，以及美元升值之後，對釘住美元匯率的亞洲各國產生嚴重影響，因而埋下亞洲金融問題的遠因。^⑮

這段描述有三個錯誤。第一，赤松要的古典雁行理論與 DAS、筆者重建的雁行理論，均未宣稱雁行模式是雁首帶雁群的靜態固定結構，而是雁群相互競爭，勝者領先，輸者落後。雁首與雁群成員的位置不是固定的，勝者若能迎頭趕上，將可取雁首而代之。

註⑩ Walter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 Looming Entry Barrier: Japan'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http://www.nbr.org/pub/analysis/vol8no1doc.html>>.

註⑪ William K. Tabb,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the Asian Geese," *Monthly Review*, Vol. 45, No. 10 (March 1994), pp. 31~33, 34, 36, 38.

註⑫ Lai-Si Tsui-Auch, "Regional Production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mental Impa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Production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3, No. 2 (1999), p. 347.

註⑬ 朱雲鵬、吳進泰，「知識經濟時代的傳統產業提昇」，高希均、李誠主編，*知識經濟之路*（台北市：天下文化，民國 89 年），頁 217~245；吳進泰，「兩岸產業國際競爭力消長：以雁行理論說明」，*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4 卷第 5 期（民國 88 年 5 月），頁 91~97。

註⑭ 金榮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37 卷第 1 期（民國 87 年 1 月），頁 9。

註⑮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市：遠流，民國 88 年初版），頁 223。

之，雁首後繼無力，可能落到第二層，甚至第三層的位置。如果日本經濟長期衰退，未能再居雁首地位，那麼這不但不是否定雁行理論，還是肯定雁行理論的假設。第二，金融危機是國際政治經濟週期波動表現，雁行模式包納投資模式、貿易結構、跨國企業生產區域化、對外援助、發展型國家區域化，各個層面的互動相當複雜，不是一個金融危機可以破除打垮的。第三，日圓升值、人民幣貶值及東亞各國匯率變動，只是東亞金融危機的導火線，不是所謂的「遠因」。真正的遠因在於各國內部政府、企業與金融體系之間的互動與結構（政府政策促成企業負債資產比過高），金融自由化腳步過快，調解不及，以及Wade所說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與資金氾濫的現象造成的。

相形之下，瞿宛文教授對雁行理論有較深刻的認識與批評。她知道赤松要是古典雁行理論的創始者，也指出當代的雁行理論以趕超式產品週期為立論依據，更能對雁行理論提出認真的批評。^②但是，筆者還是認為其瞭解與批評有值得商榷之處。

第一，她所引述的相關著作，不論是赤松要本人的著作，還是雁行學派（弟子與支持者）的理論闡述與經驗研究，都嫌不足或簡略。所引述的雁行理論只是根據赤松要一九六一年的論文，但赤松要自一九三〇年代起即逐漸蘊釀其雁行理論，更完整的理論輪廓要看他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論文。^③雁行學者的相關論文，只引用Korhonen（1994）的介紹，以及山澤逸平（Ippai Yamazawa）與小島清（Kiyoshi Kojima）某些研究或著作。至於雁行理論所受的批判，則是倚賴Bernard and Ravenhill（1995）的論文，並未提到其他很多重要的相關著作。例如，Ozawa對雁行理論趕超模型中的國家機關與金融體系的研析，^④Hill及Fujita對雁行理論與各種區域發展論述的比較，^⑤Dowling及Cheang以顯示性比較優勢（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指數與FDI指數檢視雁行理論中的貿易結構轉換與FDI密集程度，得到肯定的統計數字（一九七〇至一九九五年間），^⑥以及Hill與Fujita對東南亞日商跨國企業構築之區域分工的研究。^⑦

第二，因引述參考的相關著作不多，以致其批評忽略雁行理論完整的理論命題與豐富的經驗研究。她認為產品週期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都是以薪資差異解釋國際分工模式，可是古典與當代的雁行理論強調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可以調整改變，

註② 瞿宛文，*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唐山出版社，民國92年），頁195～201。

註③ Kaname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Preliminary*, No. 1 (March-August 1962), pp. 3～25.

註④ Terutomo Ozawa, "The 'Hidden' Side of the 'Flying Geese' Catch-up Model: Japan's Dirigiste Institutional Setup and a Deepening Financial Moras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2, No. 4 (December 2001), pp. 471～491.

註⑤ Hill and Fujita, *op. cit.*, pp. 285～97.

註⑥ Malcolm Dowling and Chia Tien Cheang,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sia: New Tests of the 'Flying Geese' Model,"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1, No. 4 (Winter 2000), pp. 443～463.

註⑦ Richard Child Hill and Yong-Joo Lee,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and East Asian Development-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Leslie Sklair ed.,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289～315.另請參閱註⑧到註⑩所引著作。

而且比較優勢並不限於薪資的差異，下文介紹的古典與當代雁行理論就是明證。再者，她主張雁行理論不能解釋雁行編隊的階層差異，或者台灣、南韓為什麼一定是排在東南亞國家之前。其實，雁行理論這種說法可以說是一種命題或假設。在一九七〇或一九八〇年代，論者恐怕很難說多數東南亞國家的工業化程度會高於東亞四小龍，因為當時的東亞四小龍工業化的程度的確比較高，步調也比較快，雁行理論做此假設或認定，似無不妥之處，所差只是有待資料驗證。可是，學者的經驗研究也發現，東亞雁行編隊中各國的產業發展的確有層次上的差異。例如，石川城太製作數個座標圖，以亞太各國（含美國、加拿大、紐西蘭與澳洲）標示各國產業發展的軌跡與位置（一九八二～一九九二年）。這些座標圖有的以製造業與服務業所占比重為X軸與Y軸，有的以輕工業產品占總出口比重為X軸，機械產品占總出口比重為Y軸。結果顯示各國的確在產業發展的方向上有時間與各級產業比重上的落差。^⑩

第三，此位學者的其他批評，與筆者的理解大有不同。就筆者所能看到的文獻，雁行理論並未預設日商投資必然與其他跨國企業不同或有異；日商海外投資不必然只是考量薪資差異的因素；雁行理論並未預設或認定後進國家必然趕上領先國家，或後進國家絕對不會依賴領先國家；雁行理論也未認定日商一定會強化當地採購。更重要的是，就國家而言，雁行理論並不只是針對紡織業的發展，而是針對國家產業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之間的螺旋提昇。它既可以是指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轉換，也可以是指個別產業的起落。

綜上所述，國內對於雁行理論確實缺乏一定的認識與瞭解，需要論者找出共同的分母（理論架構）或平台，以利討論。以下即簡略介紹古典與當代的雁行理論。論者或許會批評以下的重建並非創見，但若能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再次勾勒或突顯值得注意的層面，應不為過。

叁、雁行理論：古典與重建

究竟赤松要所說的雁行理論是什麼樣子？當代重建過的雁行理論又包含什麼成分？不追究這些問題的答案，不足以探討雁行理論的地位、價值及其優缺點。

赤松要依據日本工業化的經驗，於一九三〇年代提出雁行理論。他分析日本紡織業與機械工業的貿易資料，指出雁行模式的發展階段、過程與結構，企圖以此推論解釋日本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發展。首先，赤松要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可依其工業化與經濟成長，分成不同的階層：先進國、中間國與跟隨國。雖然這三層係依技術能力、經濟成長而排列，但這不是說各國在這三層的地位是固定的，而是說他們彼此不斷競爭。先進國努力維持領先，造成先進國與後進國之間的產業結構異質化（heterogenization），產業與技術發展層次均領先後進國（如資本密集對勞力密集），後

註⑩ Terutomo Ozawa,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in Alan M. Rugman and Gavin Boyd, eds., *Deepening Integration in the Pacific Economi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9), pp. 57~64.

進國則努力迎頭趕上。若後進國能達到先進國的層次，從勞力密集升級到資本密集，那麼後進國與先進國即處於產業同質化（homogenization）的階段。但若先進國能夠再升級至技術密集的層次，那麼先進國與後進國的產業發展層次即再度表現為異質化。如果先進國不能持續升級，甚至被後進國迎頭趕上，那麼後進國就可能成為先進國，甚至成為雁首。^③

其次，赤松要所說的雁行模式不是指全球各國都在同一個編隊裡面，而是指全球可依區域分成三個編隊。這些編隊分別是美洲、東亞與歐洲。北美雁首為美國，歐洲雁首為西歐國家，亞洲雁首為日本。^④再者，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工業化階段可分成七個階段，又可簡化為三個階段：進口、國內製造、出口。製造與出口階段又可細分為三個階段：生產粗糙產品、出口粗糙產品，然後是生產並出口品質較為精良的產品。^⑤

這裡要特別強調：赤松要的雁行理論所說的產品生命週期與 Vernon 所說的產品週期不同。Vernon 的產品週期理論是依據美國企業的經驗，把產品週期分成創新、成熟或標準化、海外投資生產，^⑥不宜用於分析新興工業國家的產業發展。赤松要所說的產品週期是根據後進國家的經驗（跨國企業在後進國家投資生產），從製造過程切入，再回頭發展後向鏈結（backward linkages），累積技術能力，並往前向鏈結（forward linkages）發展，開拓市場與行銷管道。

赤松要的雁行理論已經點出 FDI 模式與貿易結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這兩者也成為雁行理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個新興工業國家的產業發展從進口替代轉變為出口導向，或者從二次進口替代轉變為二次出口導向，都與外資、跨國企業有密切的關係。在雁行模式之中，美國是台灣、南韓、多數東協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與創匯來源，可是這些新興工業國家與美國對日貿易卻飽嚙逆差之苦，形成不均衡的三角貿易結構。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日商海外投資數量逐漸增加，援外政策也逐步確立，不但有外交考量，更有經濟目的與關連。^⑦從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日本雙邊援外資源，包括無償贈與、技術協力與政府貸款，也長期集中在亞洲，尤其是東南亞與中國大陸。日本政府利用投資貸款與援外資源，鼓勵中小企業廠商在特定（亞洲）國家建構區域生產網絡，供應大型日商與當地市場。政府與半官方組織、研

註③ Pekka Korhonen, "The Theory of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1, No. 1, p.95; Hill and Fujita, *op. cit.*, pp. 287~288; Kaname Akamatsu, *op. cit.*, pp. 4~11.

註④ Akamatsu, *op. cit.*, p. 18.

註⑤ Korhonen, *op. cit.*, pp. 96~98; Akamatsu, *op. cit.*, pp. 12~16.

註⑥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No. 2 (1966), pp. 196~203; Raymond Vernon, "The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1, No. 4 (1979), pp. 255~269.

註⑦ 柯玉枝，「當前日本對外援助政策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6期（民國90年11、12月），頁32~33, 43。

究機構更透過調查，瞭解各國比較利益，建議適合發展的產業，提供產業發展諮詢與技術訓練，引領受援各國一方面發展適合的產業，另一方面也可配合日商的海外投資與區域分工，建構跨國轉包與供應網絡。根據日本政府的規劃，這是日本與亞洲各國的經濟協力，包括雙邊與多邊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ODA）、其他政府資金（other official flow），以及私人資金（出口貸款與 FDI）。經濟協力的根本目的是以 FDI、援助、區域分工構成新的共榮圈。^{③④}在日本政府的「新亞洲產業發展計畫」（new asian industries development plan）當中，日本是這種共榮圈的首腦，大東亞區域內各國則是身體與四肢。^{③⑤}

雁行理論為人批評最多之處，就是跨國區域生產網絡。批評者認為，日商雖在東亞與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投資生產，卻不願意轉移技術，不願意在當地採購，不願意培植當地廠商的供應網絡（即使有當地供應商，也是極盡壓榨剝削之能事），而是從日本進口關鍵零組件與半成品，或是帶領原在日本的供應商到大型日商企業投資的國家投資，以便維持原有的供應關係。即使產品回輸日本，也是由海外分公司賣給母公司，也就是所謂的企業內貿易，無助於大幅改善貿易夥伴的貿易逆差。^{③⑥}日商在大東亞地區的生產網絡或生產區域化是兼具階級剝削與資本累積宰制的結構。不但勞工工資遭到壓抑，終身雇用制動搖，海外投資生產更成為日商、台商、韓商、東協國家企業壓制本國勞工，爭取商機的手段，同時在日商的垂直整合區域網絡架構之下，台灣、韓國、東協等新興工業國家成為日本的半邊陲與邊陲，台商、韓商的海外投資與生產網絡只是配合日商買主的需要，是受到宰制的區域化。^{③⑦}

這些批評者的指控不是沒有道理，沒有根據，但問題是社會科學家經常受到價值觀與觀點的驅使，只看他們想要看到的現象、趨勢與證據。他們選擇的觀點與角度常令他們忽略其他的現象與證據。雁行理論的研究不是否認技術依賴、不均衡貿易、對勞工與供應商的剝削、發展造成的環境破壞與污染。雁行理論只是一個中程理論，其目的是瞭解、剖析一個區域的國家如何因工業化過程、技術層級與經濟發展層級的落差而形成動態的、彼此競爭的階層架構。日本、日商想要掌握全局，這是事實，問題是新興工業國家的政府與廠商能不能提出任何策略、方法、措施，克服這種依賴困局？是否這些後進國家與廠商只是坐以待斃，束手無策，完全聽任日本與日商的擺佈與宰制？這些都需要深入瞭解。單單空泛地指控台、韓商的區域化生產是被宰制的生產，無疑是以簡化的論證概括現實，忽略這些國家、廠商的考量、策略，以及海外投資生

註③ Chia-Huang Wang, "Flying Together?: Taiwan and the Flying Geese Developmental Model," dissertation, Dept. of Soci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註④ Hatch and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p. 120.

註⑤ *Ibid.*, pp. 158~171; Hatch, "Grounding Asia's Flying Geese: The Costs of Depending Heavily on Japanes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1998,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briefing/hatch98/index.html>>.

註⑥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A Critique of 'Flying Gees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Vol. 74, No. 2 (April 1998), pp. 87~110.

產的背景與脈絡。

技術依賴並非雁行模式的專有現象，凡是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無不珍視、保留自己最先進的技術知識與科技成果，因為這是他們與同業競爭最寶貴的資產。即使是美商也不會輕易將核心技術與科技研發成果轉移給新興工業國家的企業或合作夥伴，除非這些技術、產品已經標準化，缺乏競爭力。就算要轉移，也要看合作夥伴或投資標的國是否有能力接受。不均衡貿易也是資本主義體系必然的現象，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長期依賴美國市場，受制於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特別是301條款），更是事實。與其說這是雁行模式的錯，不如說這種現象是冷戰的政經結構遺產。而且，每個國家的地位、狀況不盡相同，依賴美國市場的現象已有轉變。以台灣而言，中國大陸已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或者說，台灣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程度太深，甚至達到危險的地步。然而，這種不均衡的貿易模式自有其動力，恐非雁行模式一手所能造成。至於剝削勞工與供應商，此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致，非雁行模式能一肩挑起，而且這還要看產業部門而定。舉例言之，本來國際電腦大廠惠普、戴爾委託台商代工設計製造個人電腦與筆記型電腦，由代工廠商自行尋找供應商，其間廣達、英業達等代工廠商可壓低供應商價格，藉以增加利潤。然而，自從國際大廠收回零組件採購權之後，台灣代工廠商獲利空間即受到擠壓，報價必須自我壓低，才有可能爭取到訂單。惠普、戴爾不是日商，壓榨代工廠商的手法也不輸日商，顯然問題關鍵不在日商，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所致。最後，對環境的破壞與污染，是否只有日商才是罪魁禍首？不是日商，卻造成嚴重污染的跨國企業所在多有。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發、剝削自然資源與環境的方法，這點馬克思早已提出指控，批評者恐難獨厚日商。半導體產業，尤其是晶圓製造產生的廢水、廢棄物對環境的威脅更大，日商也不是台灣半導體產業唯一的客戶，單單歸咎於日商，恐怕不盡公允。

日商區域化生產網絡的關鍵在於它的產品生命週期與美式產品週期不同。Hill 及 Fujita 指出，美式產品週期是從創新開始，進入標準化大量生產，然後移至海外生產，反向出口回美國。這種產品週期在技術成熟，研發新的技術之後，即棄如敝屣，或轉移給後進國家。相對地，日式產品週期不是率爾丟掉成熟技術與產品，而是在既有基礎上持續改良，掌握關鍵零組件與技術，將成熟技術轉移給後進國家與廠商，形成跨國分工的架構。^⑩這種手法與策略雖可說是垂直分工，卻也是後進國家循日式產品週期力爭上游的管道之一。

表一顯示日商與後進新興工業國家（新加坡）的分工架構。這個表顯示後進國家不但接受日本的標準化技術，投入生產，本身還升級生產更高階產品。也就是說，這種日式產品週期是動態的、演進的。

註⑩ Richard Child Hill and Kuniko Fujita, "Product Cycles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s of Labor: Contra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David Smith and Jozsef Borocz, eds., *A New World Order?—Glob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5), pp. 91~108.

表一 電子產品的雁行編隊與產品週期

影音產品	
留在日本	彩色電視機（數位、高解析度）、寬螢幕電視機、S-VHS 錄放影機、雷射影碟機、高階音響設備
移出日本	傳統彩色電視機（包括傳統大尺寸類型）、錄放影機（標準型）、出口之影音產品（標準化高價產品）
移出新加坡	彩色電視機（小尺寸）、影音產品（低價）。
電腦產品	
留在日本	電腦顯示器（大尺寸，17-21 吋）、客製半導體
移出日本	顯示器（14-15 吋）、電腦周邊、16M DRAM、3 吋半硬碟機、半導體（整合生產）
移出新加坡	軟碟機組裝
家庭電器	
留在日本	微電腦自動控制洗衣機
移出日本	冷氣機（出口）、雲幕燈（ceiling light）
移出新加坡	洗衣機用壓縮機
電子裝置	
留在日本	超導體電容器（電視用）
移出日本	冰箱壓縮機、陰極射線管、主軸馬達、變電器、諧振器等
移出新加坡	電池、電子零件、電容器（標準型）等
電信設備	
留在日本	傳真機（辦公室用）
移出日本	行動電話（標準型）、傳真機（標準型）

資料來源：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引自 Hideaki Ohta, Akihiro Tokuno, and Ritsuko Takeuchi, "Evolving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Japanese Firms in Asia," in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s., *The New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p. 45.



再從上游、中游看日商區域生產網絡。就上游而言，日商是否真的完全掌控關鍵零組件與技術，新興工業國家與廠商完全沒有能力突破，也要看產業部門與個別企業而定。例如，三菱汽車仍在東協各國分散佈局生產各種零組件。^④但東協汽車製造商已能生產引擎。豐田汽車協助台灣廠商製造引擎活塞，出口到日本。^⑤台灣國瑞（豐田）汽車每年出口4000座引擎到日本，藉以交換在工業區設廠。^⑥泰國汽車製造商已能生產柴油引擎，出口到馬來西亞，印尼廠商則製造汽油引擎，出口到馬來西亞。^⑦Fujita及Hill也指出，馬來西亞的Proton車廠已能生產三門轎車（Pronton-Satria），不需要三菱汽車隨時協助。^⑧

其次，Fujita及Hill也指出，日本汽車製造商在東協的區域生產網絡並非涇渭分明，各系列會社（keiretsu）之間已打破界限，納入地主國的供應商，形成混血的生產網絡。豐田、五十鈴、日產在各國（泰國、馬來西亞等）生產的零組件彼此出口到其他東協國家，供應其他日商系列會社組裝。^⑨有的還超越貿易，合資組成更複雜的後系列會社（post-keiretsu）生產網絡。^⑩部分台灣汽車零件供應商也跟著日本母廠到東南亞投資生產。^⑪可見Hatch及Yamamura所說的封閉性、排他性生產網絡不盡真確。

綜上所述，當代的雁行理論不只是貿易結構轉變反映出的產業升級與產品週期，更應該包括外向（outflow）FDI、貿易結構、企業的跨國區域生產網絡、趕超的產品週期、援外政策與策略，以及發展型國家的區域化（以貸款、援外、諮詢、訓練，鼓勵上下游廠商建立跨越國界的生產網絡）方略與行動。更重要的是，雁行理論從來沒有說過日本是雁行模式存續的唯一因素，更不會斷定日本永遠是全亞洲或大東亞地區產業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只是斷定雁行編隊的成員必須彼此競爭，否則就是不進則退。雁首落後不表示雁行編隊瓦解，而是顯示新的雁首出現。

或許有論者會批評：這種重建只是大雜燴，並不是什麼重建。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什麼是重建。重建是指去除刻板印象與想當然爾的猜測，先回顧並還原理論創始者所要講的理論面貌，再把時間拉回到當代，針對新的發展與現象，探討原先

註④ Hatch and Yamamura, *op. cit.*, p. 34.

註⑤ Hill and Lee, *op. cit.*, p. 299.

註⑥ Gregory Noble, "Trojan Horse or Boomerang?—Two-Tiered Investment in the Asian Auto Complex," *The BRIE Working Paper*, 1996, <<http://brie.berkeley.edu/BRIE/pubs/wp/wp90.html>>.

註⑦ James C. Abegglen, *Sea Change—Pacific Asia as the New World Industrial Cen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p. 220.

註⑧ Fujita and Hill, *op. cit.*, p. 314

註⑨ Fujita and Hill, *op. cit.*, pp. 320~321.

註⑩ I-Chi Kang, "Japanese Auto Parts Industry—New Challenge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Created in Southeast Asia," 1997, <<http://www.cetra.org.tw/mars/mkrpt/jpnauto.htm>>.

註⑪ Noble, *loc. cit.*



的理論能夠解釋什麼，不能夠解釋什麼。能夠解釋的部分予以強調，不能解釋的部分則予以修正、補充、調整。例如，赤松要對 FDI 所言不多，或因其時代背景所限，焦點自然放在貿易及其反映的產業結構轉換。對此，當代論者即應將 FDI 包括在內，因為 FDI 已經是比較優勢與經濟資產跨國流動的重要機制，其重要性不遜於單純貿易的互通有無。重建不是死守教條，而是根據原有理論調適、應用。各種成分環節也許看起來稀鬆平常，問題是我們能否跟上潮流，把它們連在一起，進行觀察與分析。重建也不是建立權威性地位，只是希望引起認真的研究與辯論。

第二，把 FDI 模式、貿易結構、跨國區域生產網絡、產品週期、援外政策與策略、發展型國家的區域化行動與方略放在一起，視為當代雁行理論的成分，是否真的是大雜燴？經濟學家與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政治學家不同之處，就在於（新古典或純）經濟學家只看經濟因素，後三者不是只看經濟因素，更要看政治與社會因素，以及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社會因素彼此之間的連鎖互動。貿易已經不是單純的互通有無，製造業 FDI 的密集流動，已經形成綿密的區域與全球生產網絡，這種跨國生產網絡則促成相當的企業內與產業內貿易，對地主國與投資母國的產業形成或正或負的影響。把這些因素拆開來看，恐怕會漏失其連帶關係。再者，根據筆者學位論文與其他雁行學派學者的研究，東亞雁行模式或現象絕不只是單純的經濟現象，雁行理論的思維已經滲入日本政府與部分產學界人士的思維，影響到他們的主張與行動。如果不把這些因素連起來觀察，就無法理解為何日本援外，尤其是 ODA 為何高度集中在大東亞地區，又為何隨時間推移，搭配 FDI 與貿易流動，將重心從早期的台灣、南韓移到中國大陸與部分東協國家。^④更無法解釋為何日本對大東亞地區的 ODA 當中，政府貸款（利息回收的經濟考量）的比重遠高於無償贈與和技術協力。

例如，表二的資料顯示日本在一九九九年對世界各國的 ODA 分佈。日本對亞洲各國 ODA 中的贈與只占總金額 31.7%，政府貸款卻占 68.3%。對東協各國贈與只占 24.1%，政府貸款卻占 75.9%。相形之下，對中東、中南美洲的 ODA 中，政府貸款所占比重不超過三成（28.5%與 28.8%）。另外，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資料，在一九九八年的雙邊 ODA 當中，部門分佈以社會經濟的基礎建設最多，社會基礎建設（包括教育與健康等）即分到 20.2%的金額，經濟基礎建設（運輸、倉儲、金融、通訊等）分到 39.0%的金額。表三的資料更顯示，日本不但是亞洲首要 ODA 援助國，投入亞洲的金額與比重（60.2%）更遠超過其他區域的首要援助國，如法國在大洋洲（52.8%）、美國在歐洲（33.5%）。這種雙邊 ODA 的寬廣經濟考量，企圖為日本的雁首地位奠定穩固的區域分工基礎，無疑是當代由日本領首的雁行模式的一大特色。^⑤

註④ 這裡無法將筆者博士論文的相關百餘頁資料完全在這裡呈現。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 Wang, *op. cit.*, 或請參閱 Dilip K. Das,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註⑤ 瀏覽外務省網站，<http://www.mofa.go.jp/policy/oda/summary/1999/d_g2_03.html#c_2_5>。

表二 日本對外援助：類型與地區分佈（一九九八）

（單位：百萬美元）

政府開發援助（ODA）					
贈與 (Grant Aid)					
	無償資金 協力	技術協力	小計	政府貸款等	合計
亞洲	882.91	1,217.75	2,100.66 (31.7 %)	4,529.92 (68.3 %)	6630.58 63.2
東協	393.91	549.14	943.04 (24.1 %)	2,977.58 (75.9 %)	3920.62 37.3
汶萊	--	0.10	0.10	--	0.10
柬埔寨	27.62	23.25	50.87	--	50.87
印尼	100.54	130.80	231.35	1374.49	1605.84
寮國	86.22	32.03	118.25	14.29	132.53
馬來西亞	1.27	68.49	69.76	52.85	122.61
緬甸	9.08	15.47	24.55	9.63	34.18
菲律賓	82.23	92.08	174.30	238.68	412.98
新加坡	--	1.27	1.27	--	1.27
泰國	2.09	123.99	126.08	754.18	880.26
越南	84.87	61.66	146.53	533.46	679.98
中東	274.53	132.68	407.21 (74.8 %)	136.94 (25.2 %)	544.15
歐洲	133.48	57.33	190.82	-39.70	151.12
非洲	693.08	221.20	914.27	80.35	994.63 9.5
中南美	256.18	323.01	579.19 (71.1 %)	235.22 (28.8 %)	814.41
大洋洲	69.72	53.56	123.29	14.95	138.23
其他	30.11	1,193.60	1,223.70	0.89	1,224.60 11.7
總計	2,340.02	3,199.16	5,539.17	4,958.58	10,497.76

資料來源：外務省，ODA白書，1999。轉引自ASEAN-Japan Center：<<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base11.html>>。

表三 一九九九年全球各區域首要 ODA 援助國

(單位：百分比與百萬美元)

	1	2	3	4	5
亞洲 (11,007)	日本 (60.2)	其他 (17.7)	美國 (10.4)	德國 (7.5)	英國 (4.2)
中東 (3,521)	美國 (33.0)	法國 (22.5)	其他 (18.1)	日本 (15.4)	德國 (11.0)
大洋洲 (1,370)	法國 (52.8)	澳洲 (16.7)	美國 (13.4)	日本 (10.1)	其他 (7.0)
歐洲 (2,562)	其他 (45.1)	美國 (33.5)	德國 (8.3)	荷蘭 (6.6)	法國 (6.5)
中南美 (4,240)	其他 (33.1)	美國 (29.2)	日本 (19.2)	德國 (9.4)	西班牙 (9.1)
非洲 (8,344)	其他 (44.8)	法國 (17.0)	美國 (15.2)	日本 (11.9)	德國 (11.1)

資料來源：Keizai Koho Center, *Japan 2003: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okyo: Japan Institute of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2002), p. 90.

肆、東亞金融危機與雁行理論

拜東亞世紀末金融危機之賜，雁行理論引起另一場小論辯，只是這場論辯在台灣政治經濟學界也沒有激起太大的漣漪。論辯的中心在於雁行理論與東亞金融危機的關係，特別是金融危機對發展型國家、東亞發展模式的影響。Hatch 認為，西方學者討論大東亞金融危機，經常忽略日本與區域內各國之間的依賴關係，以及日裔在大東亞地區的生產網絡。在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東亞各國太過依賴日本的資金與技術，以致未能發展出自主的技術能力，無法進行全球競爭。各國大量自日本進口資本財與半成品，導致經常帳赤字不斷增加。日裔在大東亞地區的生產網絡在地化不足，轉移技術的步調緩慢。即使是轉移技術，也有半數以上是企業內轉移（母公司轉移給海外子公司）。日本經濟長期衰退，日圓貶值，衝擊到南韓的出口市場，人民幣貶值也影響到東南亞各國勞力密集產品的出口市場，導致各國經常帳赤字更加嚴重。日裔生產網絡為提高利潤，不但放慢技術轉移的腳步與幅度，更在價格上擠壓當地合資夥伴與供應商，使其利潤益加縮減。此時若外資急速抽離，自然造成金融危機。^⑤

Altbach則認為，Hatch的指控過於誇張。金融危機的根源不只一端：全球電子產品市場需求衰退；短期金融債信急增；東亞與東南亞國家決定釘住美元，以致傷及出口；匯率貶值的預期令人恐慌，因為以日圓、美元向外國銀行申請的貸款勢必造成損

註⑤ Hatch, *loc. cit.*

失。完全歸咎於日商在大東亞地區的生產網絡，恐怕是找錯對象。^{⑤②} Crafts 則指出，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自由化步調太快，金融管理不善，總體經濟政策失調，短期外幣借貸太多，但東亞各國成長的潛力仍在，只要各國能調整總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加強人力資本，促進技術創新，強化社會能力（social capabilities，如教育投資、政府表現、制度環境、投資環境資金供給），而非一味依循以往依賴短期快速的要素累積（factor accumulation），那麼東亞各國仍有浴火重生的機會。^{⑤③}

究竟哪一方較有道理？筆者認為，Wade 的比喻較為恰當。東亞金融危機其實是國際政治經濟輪中之輪（wheels within wheels）的呈現。也就是說，東亞金融危機既有其外在導因，也有其內在肇因。大輪與小輪彼此互相牽動，造成金融危機。大輪是國際金融市場失靈，過多資金流竄造成的結果（資金過多則是美國出售債券，改善赤字，卻讓購買國的外匯存底累積過多，造成經濟過熱，再加上國際資金素喜投入股票與不動產市場，促成泡沫經濟），小輪則是東亞各國金融自由化缺乏配套保護與調整措施的結果。^{⑤④} Hatch 認為雁行模式造成東亞金融危機，但他並未解釋為何只有南韓、泰國、印尼等國深受其害，台灣、新加坡，乃至於中國大陸的境遇卻好過前列國家。如果雁行模式真的要為金融危機負全責，那麼日本、四小龍與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理應無一倖免才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可見金融危機的根源必須另做探討。其實，只要略為比較台、韓兩國的產業結構（中小企業為主與財閥為主）、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南韓企業借貸比例往往遠超過資產數倍）與金融政策、金融體系，即可發現為何南韓受傷遠比台灣慘重。

如果雁行理論很難說是東亞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那麼金融危機是否顯示雁行理論或東亞發展模式不再適用？金榮勇認為，金融危機令南韓、東南亞各國飛雁受傷慘重，雁首日本長期苦於泡沫經濟，金融壞帳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大中華經濟圈暫時逃過一劫，越南、柬埔寨、寮國必須忙於起碼的生存需求。雁行編隊遭到金融危機的衝擊，四分五裂，失去方向，快速成長的模式缺失重重，各國經濟自由化的前途不明。^{⑤⑤} Sikorski 及 Menkhoff 則沒有這麼悲觀。他們認為雁行理論需要考量強勢日圓、弱勢美元的新經濟情勢，重新翻修。^{⑤⑥}

要討論雁行理論是否已經破產，雁行編隊已經七零八落，我們不妨回頭看重建過的雁行理論，並思考下列問題：金融危機是否促成FDI大幅減少？三角貿易模式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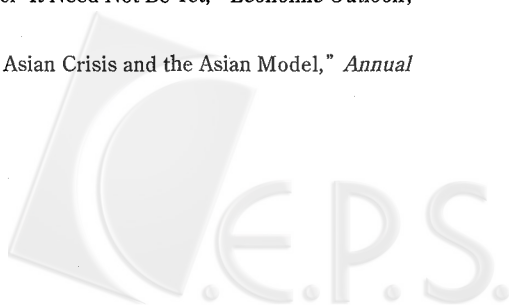
註⑤② Eric Altbach, "Weathering the Storm? Japan'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and the Regional Crisis," *Japan Economic Institute Report 35A* (18 September 1998), p. 8.

註⑤③ Nicholas Crafts, "Asia's Miracle: They Think It's All Over—It Need Not Be Yet," *Economic Outlook*, Vol. 23, No. 1 (November 1998), pp. 11~21.

註⑤④ Robert Wade, "Wheels Within Wheels: Rethinking the Asian Crisis and the Asian Model,"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2000), pp. 85~115.

註⑤⑤ 金榮勇，前引文，頁13~14。

註⑤⑥ Sikorski and Menkhoff, *op. cit.*, p. 15.



已經改變？日本援外政策是否已經改弦易轍？援外資源是否已經山窮水盡，無以為繼？產業區域分工架構是否已經瓦解？發展型國家是否已經衰頹，提不出國家發展的願景，再也無法主導產業政策、金融政策、貿易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這裡以日本為例，探討這些問題。

先看日本外向FDI的區域與產業部門分佈。就投資金額的區域分佈而言，根據表四的資料，日本二〇〇一年的FDI以非製造業較多，占總額54.9%，製造業占44.1%。亞洲占製造業FDI比重達29.0%，超過北美的24.7%，但落在歐洲的34.3%之後。歐洲聯盟比重居首，可能是區域經濟整合的貿易轉移效果誘使日商到當地投資，避開歐洲關稅壁壘與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但是，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三年後，亞洲占日商製造業FDI仍超過美國。在非製造業部分，日商FDI集中在中南美與歐洲，兩者各占35.7%與33.1%，亞洲與北美則各占10.9%與17.3%。若與製造業對亞洲投資的比重對照，似乎有區域分工（製造業對非製造業）的態勢。

其次，就個別產業部門的區域分佈而言，日本二〇〇一年投入製造業的外向FDI以電機、運輸機械為主，各占26.2%與31.1%，其中電機部門有29.7%在亞洲，37.7%在美國，運輸機械大部分在歐洲，占總額74.3%。亞洲獲得日商化學與鋼鐵工業之金額均超過美、歐兩洲。非製造業方面，金融保險業占非製造業總額（21,744億日圓）61.9%，中南美與歐洲各占金融保險業的47.1%與41.2%，商業則以北美與歐洲為主，各占45.4%與34.4%。

綜觀這些數字，日商FDI在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區域分佈上呈現區域分工的傾向，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子部門的投資金額也有區域分工的現象。若再看日商FDI流向亞洲分公司的比重占86.8%，顯然金融危機重創雁行編隊的看法稍嫌誇大。或者說，即使金融危機曾有影響，也已恢復。

表四只呈現日本FDI在二〇〇一會計年度的分佈狀況，表五則從逐年角度呈現日本外向FDI的區域分佈。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亞洲所占比重從一九九八年的16.0%降到次年的10.7%，再回升到二〇〇〇年的12.2%與二〇〇一年的19.5%。金額從一九九八年的8357億日圓，逐年遞減至二〇〇〇年的6555億日圓，但到二〇〇一年又回升到7730億日圓。投資件數也呈現類似的走向。日商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主要投資國，尤其是印尼與泰國，所獲日商投資金額與件數也大致呈逐年減少的趨勢，直到二〇〇一年才回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不過二十年，大舉接受外資更是近十年來的政策，但從一九五一到二〇〇一年，中國大陸所得日商FDI件數已超過東協各國，計4801件，金額也遠超過多數東協國家（印尼例外），達25969億日圓，占總額百分比為2.3%，高過東協多數國家。這些數字在在顯示，儘管金融危機可能衝突到日商在大東亞地區投資的金額與件數（金額減少也可能是階段性投資飽和所致），但日商對東亞地區的FDI在世紀之交是呈現U形發展，而非編隊瓦解或轉走下坡。

表四 二〇〇一會計年度日本對外FDI

(單位：億日圓)

產業別	區 域															
	合計		亞洲		北美		中南美		中近東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製造業	526	17,449	332	5,062	100	4,311	5	1,812	1	8	81	5,991	3	85	4	180
		44.1%		29.0%		24.7%		10.4%				34.3%				
食品	27	1,024	13	771	12	216	-	3	-	-	1	7	-	-	1	27
紡織	23	254	14	119	4	37	2	4	-	-	3	94	-	-	-	-
木材	10	916	7	50	2	19	-	838	-	-	1	7	-	-	-	2
化學	59	1,867	33	741	14	641	1	272	-	-	10	212	1	1	-	-
鋼鐵	56	795	39	518	8	195	1	5	-	-	8	43	-	-	-	34
機械	60	1,525	34	366	10	714	-	25	-	-	15	418	-	-	1	2
電機	145	4,580	100	1,360	24	1,726	1	427	1	8	17	970	-	-	2	89
		(26.2%)		29.7%		37.7%										
運輸機械	85	5,424	51	647	18	575	-	93	-	-	15	4,029	1	80	-	-
		(31.1%)										74.3%				
其他	61	1,062	41	489	8	188	-	144	-	-	11	211	1	4	-	26
非製造業	1,221	21,744	157	2,360	107	3,770	147	7,770	2	17	777	7,193	10	154	21	479
		54.9%		10.9%		17.3%		35.7%				33.1%				
農林業	7	42	2	5	1	21	-	-	-	-	-	9	-	-	4	8
水產業	4	34	2	11	1	6	1	17	-	-	-	-	-	-	-	-
礦業	9	600	1	6	1	128	2	114	-	-	3	70	-	-	2	282
營造業	7	81	6	74	-	-	-	-	-	-	1	7	-	-	-	-
商業	133	3,225	56	443	37	1,464	1	110	1	10	30	1,108	1	5	7	85
						45.4%						34.4%				
金融保險	791	13,454	32	987	11	566	39	6,335	-	-	707	5,540	-	-	2	26
		(61.9%)						47.1%				41.2%				
服務業	134	1,940	43	604	46	979	13	150	1	7	27	184	-	-	4	16
運輸業	114	1,677	6	41	5	300	90	1,042	-	-	5	171	8	115	-	8
不動產業	21	657	9	190	5	307	1	2	-	-	4	103	-	-	2	55
其他	1	33	-	-	-	-	-	-	-	-	-	-	1	33	-	-
分公司	6	355	6	308	%-	-	-	1	-	-	-	43	-	2	-	-
				86.8%												
總計	1,753	39,548	495	7,730	207	8,081	152	9,583	3	25	858	13,228	13	241	25	660

資料來源：ASEAN-Japan Center, <[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Statistics%2002/inv05\(02\).html](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Statistics%2002/inv05(02).html)>。

註：斜體字百分比係橫向除以總額，括弧內百分比係縱向除以上層總額。



表五 日本 FDI 區域分佈（一九九八至二〇〇一年）
（單位：億日圓）

區 域	會計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累計 1951-2001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北美	334	14,011	355	27,629	280	13,562	207	8,801 (20.4 %)	31,660	443,728 (39.8 %)
中南美	244	8,274	240	8,295	200	5,783	152	9,583 (24.2 %)	10,120	142,309 (12.7 %)
亞洲	537	8,357 (16.0 %)	528	7,988 (10.7 %)	448	6,555 (12.2 %)	495	7,730 (19.5 %)	29,984	195,028 (17.5 %)
東南亞國協	282	5,159	273	4,404	179	2,751	183	4,264 (10.8 %)	14,348	112,371 (10.1 %)
汶萊	-	-	1	2	-	-	-	- (0.0 %)	33	399 (0.04 %)
柬埔寨	-	-	-	-	-	-	-	- (0.0 %)	6	7 (0.001 %)
印尼	62	1,378	57	1,024	25	457	51	576 (1.5 %)	3,067	43,537 (3.9 %)
寮國	-	-	-	-	-	-	-	- (0.0 %)	18	11 (0.001 %)
馬來西亞	32	658	44	586	23	256	18	320 (0.8 %)	2,224	13,714 (1.2 %)
緬甸	1	3	2	11	1	11	-	- (0.0 %)	25	67 (0.01 %)
菲律賓	45	485	31	688	41	506	24	946 (2.4 %)	1,448	9,355 (0.8 %)
新加坡	58	815	49	1,073	23	468	30	1,223 (3.1 %)	3,380	23,387 (2.1 %)
泰國	72	1,755	72	910	61	1,029	51	1,102 (2.8 %)	3,859	20,405 (1.8 %)
越南	12	65	17	110	5	24	9	97 (0.2 %)	288	1,489 (0.1 %)
中國大陸	112	1,363	76	838	102	1,099	187	1,802 (4.6 %)	4,801	25,969 (2.3 %)
中東	4	187	1	126	6	21	3	25 (0.1 %)	427	11,828 (1.1 %)
歐洲	382	17,937	509	28,782	716	26,974	858	13,228 (33.4 %)	12,776	252,828 (22.6 %)
非洲	31	569	24	574	7	59	13	241 (0.6 %)	1,823	17,043 (1.5 %)
大洋洲	65	2,833	56	997	27	737	25	660 (1.7 %)	5,317	53,478 (4.8 %)
總計	1,597	52,169	1,713	74,390	1,684	53,690	1,753	39,548 (100.0 %)	92,107	1,116,241 (100.0 %)

資料來源：ASEAN-Japan Center, <[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Statistics%2002/inv03\(03\).html](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Statistics%2002/inv03(03).html)>。

再看日本的貿易結構。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搜集整理的資料，日本貿易在一九九八年衰退，但一九九九年即恢復成長，貿易順差在紀錄上排名第三。出口已回復金融危機之前的水準，二〇〇〇年前半年貿易量與價格也有強勢的成長。振興會對東協五國日商分公司所做的問卷調查得知：多數在二〇〇〇年會向日本採購更多零件與材料，半數以上回答回輸至日本的产品數量也會增加。^⑦日本與東亞國家的不平衡貿易結構也仍持續。日本不但是汶萊、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台灣前十大貿易夥伴，更享有對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汶萊、印尼、越南除外）。儘管多數東協國家對日貿易為逆差所苦，部分國家整體貿易差額卻在金融危機之後由紅轉藍，如東協整體、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於一九九七年之後，菲律賓、汶萊於一九九八年之後，均轉成貿易順差。少數的例外為印尼在一九九〇年代始終維持貿易順差，緬甸、越南始終保持逆差，寮國於一九九八年短暫貿易順差之後，轉成逆差。^⑧從這些貿易數字來看，金融危機也沒有對雁行編隊造成致命的衝擊，論者如何斷定雁行理論破產，雁行模式瓦解？

在生產網絡區域化方面，我們必須追問：金融危機是否破壞日式趕超產品週期？是否瓦解混血的系列會社生產網絡？是否迫使日商開放關鍵零組件，轉移重要技術給代工廠商或合資夥伴？是否瓦解日商在東亞、東南亞的垂直分工架構？這些問題，都是聲稱雁行模式瓦解、雁行理論破產的論者沒有深入探究的問題。從手邊能夠搜集到的新聞資料來看，日本消費電子與資訊科技廠商海外投資佈局的例證俯拾皆是。日本半導體需求廠商恩益禧、日立、東芝、三菱、富士通、松下、夏普、新力，都已和台灣半導體廠商結盟，或者來台下單，台灣已成為日本全球主要的DRAM、晶圓代工與特殊用途IC產品的生產中心。^⑨日本伊藤忠、三井物產、住友等大商社正招攬日商，計畫以大上海為中心，在中國大陸投資生產。^⑩日本晶片設計公司鑒於中國大陸已成世界主要資訊科技產品生產基地，也計畫到中國大陸設立事業，掌握客戶。^⑪其他像汽車工業（豐田）、筆記型電腦（東芝、恩益禧），不是找台商代工，就是到中國大陸設廠。為了提昇技術與競爭力，日商 TFT-LCD 業者更紛紛在台灣設廠投資、轉移技術或下單要台灣廠商代工 LCD 的面板與相關零組件產品。例如，夏普將 15 吋以下的面板技術轉移給廣輝電子，本身則轉向生產大尺寸電視面板與小尺寸低溫多晶矽面板（LTPS）。許多日商也將第三代以下的面板生產線轉移給台商，並準備轉往低溫多晶矽產品。其他像玻璃基板、偏光膜、濾光片、背光板，都是把標準化技術轉移給台

註⑦ JETRO,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Trade Increasingly Affec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kyo: JETRO, 2000), p. 31.

註⑧ 相關數字請瀏覽 ASEAN-Japan Center 網站，<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td_ex01.html>、<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td_ex02.html>與<[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td_ex03\(02\).html](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td_ex03(02).html)>。

註⑨ 劉在武，「台灣躍居日商重要生產腹地」，中國時報，網路版，民國 89 年 11 月 13 日。

註⑩ 邱輝龍，「日商進軍大上海，各大商社當推手」，中國時報，網路版，民國 91 年 9 月 5 日。

註⑪ 施鈺文，「日本晶片研發中心 群起「西進」」，中國時報，網路版，民國 91 年 4 月 22 日。

商，本身升級製造或研發高階產品的例證。^②由此觀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壓倒性的證據顯示雁行模式中的日商跨國區域生產網絡與日式產品週期已因金融危機而土崩瓦解。雁行理論破產的斷定缺乏堅實的依據。

在對外援助部分，照常理推斷，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濟陷入長期衰退，加上金融危機肆虐，財政理應捉襟見肘，政府開發援助理應縮減。但是，表二的資料顯示，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後，日本對外援助並未立即減少，而且大部分仍集中在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地區。一九九九年，日本援助亞洲的資金與資源，占總數 63.2%，超過半數以上。東協國家得到 37.3%。除了亞洲之外，獲得最多日援的地區是其他及非洲，分占總數的 11.7% 與 9.5%。從日本主要援外對象來看，在一九九九年前 30 國當中，14 國為亞洲國家（東南亞有 6 國，南亞與西亞居次），占近半數。在一九九八年，主要援助來源為日本的受援國有 19 國為亞洲國家，非洲只有 4 國，中南美有 10 國，大洋洲 4 國，獨立國協 4 國，歐洲 1 國。^③這些資料顯示，東亞金融危機對日本的衝擊並未立即反映在日本對外援助上。當然，長期而言，如果日本經濟繼續衰退，造成財政收入短少，那麼日本對外援助有可能減少。據悉日本執政三黨（自民黨、保守黨、公明黨）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已決議限量刪減 ODA 預算。^④輿論、民衆、學界也有不同的意見與批評，改革的呼聲不小。然而，就算刪減並進行改革，刪減與改革對象是否一定針對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國家，還不確定，因為在政策白書、一九九二年 ODA 大綱與一九九九年 ODA 中程計畫中，亞洲仍為日本 ODA 主要對象。^⑤即使刪減，東亞（中國、蒙古）與東協國家所占分量與比重是否就此落在其他地區與國家之後，也需要更新的資料，才能斷定。

上述這些數字資料顯示，雁行模式有其一定的過程與結構，東亞金融危機或許會對其造成短暫的衝擊或影響，但要像 Hatch 那樣將所有的過錯全部推到雁行模式（雁行模式是東亞金融危機的原因），或者斷定金融危機造成東亞雁行模式的瓦解（結果），恐怕都是過甚之詞。

伍、雁行理論與中國大陸：異例或肯定？

鑒於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經濟成長與出口表現，許多學者認為雁行理論已無法解釋中國大陸產業技術與經濟的發展，有的甚至提出「跳蛙理論」（或新一波大躍進），描述中國大陸的崛起。^⑥問題是中國大陸的興起，真的是雁行理論的異例嗎？^⑦

註② 王志杰，「日本光電廠群集台灣是一件大事：日本、台灣抵抗「韓流」大合作」，財訊，第 238 期（2002 年 1 月），頁 263~264。

註③ 詳細資料請瀏覽 ASEAN-Japan Center 網站：<<http://www.asean.or.jp/general/statistics/base11.html>>。

註④ 陳伯志，「日本對中共官方援助之分析：一九七九~二〇〇〇年」，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1 期（民國 90 年 1、2 月），頁 53。

註⑤ 柯玉枝，前引文，頁 38~40、50~51。

註⑥ 筆者參加台灣社會學會 2002 年會時，部分與會學者在座談會上提出此一看法。

註⑦ 陳添枝，「亞洲經濟大勢與中共角色」，經濟前瞻，第 28 號（1992 年），頁 61。

Thirlwell指出，批評雁行理論的人士不是沒有根據。中國大陸不但有快速的經濟成長，中國大陸的產業更是在勞力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高科技產業等部門均有相當的成長，並不像雁行理論所言，是由勞力密集逐漸升級到資本密集，再由資本密集逐漸升級到技術密集與高科技產業。中國大陸的出口占全球市場的比重急速增加，流向亞洲的FDI有一大部分是流向中國。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遠比日本、東亞四小龍與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家大得多，其發展層次也必定和這些東亞鄰國不同。但是，Thirlwell也指出，這種帶有中國威脅論色彩的論斷恐怕太過簡化實際的發展與問題。中國大陸的薪資固然低廉，然而勞動成本不是一切。企業或廠商也會看單位勞動成本，平衡考量勞動與生產力。中國大陸的出口占全球市場的比重水漲船高，可是薪資與實質匯率也會因為這樣的貿易表現而有上升的趨勢與壓力，從而影響到中國的競爭力。持平來看，中國大陸的興起，既帶來機會，也構成威脅。以亞洲國家來說，中國大陸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從一九九〇年的2%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4%，但在同一時段，台灣與南韓出口所占比重也從3.8%增加到5%。中國大陸對美出口增加，固然可能影響到台灣、南韓的對美出口，但東南亞國家對美出口也有增加。中國大陸對歐洲聯盟與日本的出口增加，台灣、南韓與東南亞國家對這兩大貿易對象的出口也有增加。就算中國大陸與東亞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相同，也不表示他們彼此就會短兵相接，因為從顯示比較優勢(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來看，中國大陸還是長於勞力密集與傳統產業(不過，高科技產業的RCA，以及電子、電機、成衣部門與亞洲鄰國的相似度或相關係數的確逐年增加)。再者，中國大陸的出口急增，加上許多產業以該國為加工組裝的基地，也顯示中國大陸勢必要進口資本財與原物料(這正好符合古典雁行理論的預期)，擴增各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促進區域內貿易。最後，中國大陸的確吸取大量FDI，看起來是搶走其他亞洲國家可能吸收的FDI，但如果世界銀行的估計是正確的，那麼中國大陸吸收的FDI其實有一大部分是區域內的FDI流動。這些FDI則是亞洲鄰國廠商建立跨國區域生產網絡的表徵，對鄰國究竟是威脅，還是力量的延伸，恐怕未可遽下定論。^⑧

再就單項指標來看，旅日港籍學者關志雄有鑑於RCA指數有限制，遂根據美國的進口統計資料，分析中國大陸及其鄰國的出口項目，計算各東亞國家的產品精密指數(product sophistication index)，再以之與出口金額構成比較座標，結果發現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儘管給人急速躍進的印象(所謂跳蛙理論)，但產品精密度仍偏向勞力密集產業。如果把產品精密指數標準化，即可看出各國的高低(見表六)。

註^⑧ Mark Thirlwell, "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Emerging Asia Riskwatch*, Vol. 6 (2002), <<http://www.asialine.dfat.gov.au/asialine/asialine.nsf/c8ee8f4a56abe126ca256b0c000b2a6b/71b523ee26e131b0ca256c1e00259409?OpenDocument>>.

表六 東亞國家對美出口產品精密度標準化分數

		1990	1995	2000
日本		55.2	56.5	56.6
新興工業國家	香港	41.4	43.0	42.9
	南韓	43.2	49.4	49.0
	新加坡	48.8	52.5	50.4
	台灣	44.2	47.6	48.5
東南亞國協	印尼	31.1	35.1	36.5
	馬來西亞	40.6	45.4	44.5
	菲律賓	35.0	39.8	43.5
	泰國	40.4	42.9	41.7
中國大陸		31.1	33.5	36.2

資料來源：C. H. Kwa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s Flying-Gees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S Import Statistic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2-E-009*, 2002, <<http://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dp/02e009.pdf>>.

註：50 分爲平均分數。

Rose 測量競爭力的指標是以出口模式爲基礎，依照某國較早出口某類產品的時間，排定某國的競爭等級。他以國際標準貿易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SITC）爲據，整理各國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出口資料，取 5 位數計算，排列各國競爭力等級，結果發現日本、加拿大等國等級高居全球前 4 名，台灣、南韓與香港位居全球前 20 名尾端，初步證實雁行模式的可信度。Rose 再以產品精密度出口時間的先後爲據，計算各國排名，結果發現雁行模式仍然存在：日本處於等級頂端，東亞四小龍次之，再次爲馬來西亞與泰國，印尼殿後。然而，中國大陸的等級卻似乎是異例。中國大陸的競爭力不但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四年間持續提昇，提昇幅度更超過預期。不過，論者尚難因此斷定中國大陸已經蛙跳，因爲中國大陸真正進行改革開放，要到一九七八年以後，經濟成長也是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現象。中國大陸的異常表現，只能說是有待探索追究的現象，不宜遽爾斷定爲中國大陸跳脫雁行模式。不但 Rose 持此看法，他也承認他設計的指標尚有缺陷，有待改進。⑩

綜上所述，擔心中國大陸這隻超級巨雁威脅到鄰國的經貿發展，乃自然推理必得之結果，但推斷或假設必須周全地考量可用的、令人信服的指標。這裡引述的幾位學者所設計、使用的測量指標，均顯示中國不是沒有威脅，但誠如 Thirlwell 所言，中國大陸也帶來機會。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工與龐大市場也許促成台灣或其他新興工業國家

註⑩ Andrew Rose, "Dynamic Measures of Competitiveness: Are the Geese Still Flying in Formation?" *FRBSF Economic Letter*, Vol. 97, No. 17 (30 May, 1997), pp. 1~3.

的產業空洞化，但台灣等經濟體也因為雙邊貿易而獲利，更因為空洞化的擔憂而被迫思考或著手推動產業升級。從雁行理論的原始命題來看，這也可以說是肯定理論，而非否定理論。此外，中國大陸內部也不是沒有問題，包括國債嚴重、諸侯經濟、法制不健全、工作習慣與工作倫理等，都是中國大陸必須處理的棘手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完善的解決，要說中國大陸能一飛沖天，打破雁行編隊模式，否定雁行理論，恐怕還是言之過早。^⑦

陸、結 論

有鑒於國內對雁行理論的認識有所欠缺，國外數場相關論辯猶如遠方烽火，從而所下論斷也有輕忽草率之處，本文特先介紹雁行理論支持者與批評者所提論點，繼而描述雁行理論原創者赤松要的說明與當代重建的雁行理論，最後針對雁行理論是否為世紀末東亞金融危機之因，以及金融危機是否瓦解雁行模式、弱化雁行理論的解釋力，依當代雁行理論成分與最新經驗資料，一一對照澄清。

經過本文論證，我們可以瞭解：雁行理論從未宣稱要解釋一切國際政治經濟變項，雁行理論也從未否認日本與區域內各國之間的結構性依賴與不平等關係，包括技術依賴、貿易逆差與勞工剝削問題，但這些問題有其複雜的根源，恐怕不是雁行模式一手造成的。結構性依賴與不平等關係不是片面的、絕對的、無可救藥的，重點是後進國的政府與企業是否提出政策、策略，反轉局勢。我們更可以斷定：國內外批評者宣佈雁行理論的死刑與雁行模式的結束，似乎言之過早。東亞金融危機有其結構因素與導火線，絕非雁行模式一手造成。東亞金融危機也沒有瓦解雁行模式，日商的FDI與區域分工，日本發展型國家的援外與資源調度、不均衡的三角貿易結構，在在證明當代雁行模式並未因東亞金融危機而土崩瓦解，煙消雲散。如果雁行模式仍在，那麼當代雁行理論的地位與價值仍應得到論者的重視。論者可以不同意筆者描繪的雁行模式，可以駁斥筆者重建的當代雁行理論，但批評者必須根據赤松要提出的古典理論及其命題，瞭解雁行學者（包括山澤逸平、小島清、石川城太等）的闡釋與研究，再完整地描述批評者所瞭解、認知的雁行模式與理論，才能依資料與證據，斷定雁行模式是否仍然存續，雁行理論是否仍能解釋東亞區域內某國與區域內各國之間的產業經濟連繫。

最後，筆者要特別強調：雁行理論不是沒有缺點，更不是不能推翻。如前所述，以日本為中心的雁行理論可能忽略美國資本、華僑資本與美國市場的因素，日後雁行理論的修正或否證勢必要考量這些因素。其次，東亞的自由貿易區提案若能實現，對雁行模式與雁行理論的解釋力構成什麼衝擊與挑戰，也是值得觀察的重點。總之，批評一個理論之前，必須先切實瞭解這個理論，辯論才會有交集、有結果。國外論者對雁行模式與雁行理論的認識雖不一致，但他們有起碼的認識，只是對資料的選擇與詮

註⑦ 另請參閱陳明訓，「從雁行理論看東南亞經濟發展」，二〇〇三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釋各有長短。反觀國內已出版的研究文獻，對雁行模式與雁行理論的認識，似乎還很粗淺。有的把焦點集中在貿易結構的轉變反映的產業結構，有的則直言論斷雁行模式的瓦解與雁行理論的死刑，陳添枝等人對台灣 FDI（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與台商的跨國生產分工則是少數例外。他們的研究特重行雁行模式中的 FDI 與台商跨國生產網絡，與雁行理論的主要觀點、研究頗為相合。^①

儘管如此，國外為雁行理論與模式而引發的論辯卻猶如遠方的烽火，事不關己。就學術研究而言，如果學界對雁行理論毫無興趣，自然可以隔岸觀火。但若要討論其成敗長短，這種處理方式恐怕不太妥當。日後有關雁行理論的論辯能先有更周全的認識，根據赤松要與雁行理論家的論點，瞭解國外學者說的雁行理論與論證，再做判斷，研究與論辯才有意義。

* * *

（收件：92年3月20日，修正：92年10月13日，接受：92年10月20日）

註① Chen Tain-Jy and Ying-Hua Ku, "Crea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ut of Market Imperfections: Taiwanese Firms in China,"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Vol. 1, No. 1 (April 2002), pp. 79~99. 陳添枝、顧瑩華，「台商國際化策略之選擇」，全球華人經濟力現況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來來飯店，2000年9月29~30日。



The Flying Geese Theory and Japan's East Asian Experience

Chia-huang Wang

Abstract

A variety of theories have been formulate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of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tate-centric theory,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relations are the major ones. Occasionally, the flying geese theory (or model) was mentioned. However, the flying geese theory has been employed with an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especially in Taiwan, so much so that research based on the flying geese theor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number of misunderstandings. On the one hand, researchers and critics in the Anglo-Saxon academic community have been engaging in debates without a common conceptual frame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 flying geese theory has never been fully understood in Taiwan and many critics tended to criticize the theory by common sense reasoning or narrow the focus on 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the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index that is calculated and compiled by few economists only. In view of this poor understanding, the autho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and examines empirical data to explore whether the East Asian flying formation has collapsed and whether the theory has lost its explanatory and descriptive power in the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of Japan's chronic economic stagnation.

Keywords: Flying Geese Theo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參考文獻

- 王志杰（2002），「日本光電廠群集台灣是一件大事：日本、台灣抵抗「韓流」大合作」，《財訊》，238，263-264。
- 朱雲鵬、王旭堂、王塗發、李秉正、周濟、林師模、徐世勳、廖如敏（1999），「關於雁行理論的一個檢視：GTAP 資料應用於東亞貿易與產業結構變遷之研究」，台灣經濟學會年會學術研討會，1999年12月19日。
- 朱雲鵬、吳進泰（2000），「知識經濟時代的傳統產業提昇」，高希均、李誠主編，《知識經濟之路》，台北：天下文化。
- 李登輝（1999），《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初版。
- 吳進泰（2001），「兩岸產業國際競爭力消長：以雁行理論說明」，《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4：5，91-97。
- 金榮勇（1998），「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問題與研究》，37：1，1-14,73。
- 柯玉枝（2001），「當前日本對外援助政策分析」，《問題與研究》，40：6，31-52。
- 陳伯志（2001），「日本對中共官方援助之分析：一九七九～二〇〇〇年」，《問題與研究》，40：1，51-85。
- 陳明訓（2003），「從雁行理論看東南亞經濟發展」，2003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一、三會議室，4月25-26日。
- 陳添枝（1992），「亞洲經濟大勢與中共角色」，《經濟前瞻》，28，59-62。
- 陳添枝、顧瑩華（1995），「臺灣中小企業海外投資的特徵」，《經濟前瞻》，10：4，26-30。
- 陳添枝、顧瑩華（2000），「台商國際化策略之選擇」，全球華人經濟力現況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來來飯店，9月29-30日。
- 羅金義、王章偉（1997），《奇跡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唐山出版社。
- 龐建國（1997），《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邱輝龍（2002），「日商進軍大上海，各大商社當推手」，《中國時報》，網路版，9月5日。
- 施鈺文（2002），「日本晶片研發中心 群起『西進』」，《中國時報》，網路版，4月22日。
- 劉在武（2000），「台灣躍居日商重要生產腹地」，《中國時報》，網路版，11月13日。

- Abegglen, James C. (1994), *Sea Change—Pacific Asia as the New World Industrial Center*, New York: Free Press.
- Altbach, Eric (1998), "Weathering the Storm? Japan'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and the Regional Crisis," *Japan Economic Institute Report*, 35A, 1-12.
- Akamatsu, Kaname (1962),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Preliminary No. 1, 3-25.
- Amsden, Alice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nard, Mitchell and John Ravenhill (1995),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47, 171-209.
- Chen, Tain-Jy and Ying-Hua Ku (2002), "Crea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ut of Market Imperfections: Taiwanese Firms in China,"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1 : 1, 79-99.
- Crafts, Nicholas (1998), "Asia's Miracle: They Think It's All Over—It Need Not Be Yet," *Economic Outlook*, 23 : 1, 11-21.
- Das, Dilip K. (1996),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 Dowling, Malcolm and Chia Tien Cheang (2000),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sia: New Tests of the 'Flying Geese' Model,"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 : 4, 443-463.
- ESCAP(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7),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the United Nations.
- Fukushima, Kiyohiko and C. H. Kwan (199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Asia," in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s.), *The New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3-39,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Fujita, Kuniko and Richard Child Hill (1997), "Auto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3: 3, 312-333.
- Hart-Landsberg, Martin and Paul Burkett (1998),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A Critique of 'Flying Gees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74: 2, 87-110.
- Hatch, Walter and Kozo Yamamura (1996), *Asia in Japan's Embrace—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tch, Walter and Kozo Yamamura (1997), "A Looming Entry Barrier: Japan'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http://www.nbr.org/pub/analysis/vol8no1doc.html>>.

- Hatch, Walter (1998), "Grounding Asia's Flying Geese: The Costs of Depending Heavily on Japanes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briefing/hatch98/index.html>>.
- Hill, Richard and Yong-Joo Lee (1994),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and East Asian Development--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Leslie Sklair, (ed.),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89-315.
- Hill, Child Richard and Kuniko Fujita (1995), "Product Cycles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s of Labor: Contra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David Smith and Jozsef Borocz, (eds.), *A New World Order?--Glob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91-108.
- Hill, Richard C. and Kuniko Fujita (1996a), "Flying Geese, Swarming Sparrows or Preying Hawks?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Change--The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conomy*, 1: 3, 285-297.
- Hill, Richard Child and Kuniko Fujita (1996b), "Economic Governance & Flexible Production: Matsushita in Sou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Economic Governance & Flexible Production in East Asia, October 4-6.
- Hill, Richard and Yong-Joo Lee (1994),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and East Asian Development--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Leslie Sklair, (ed.),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89-315.
-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1993),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2-23.
- JETRO (2000),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Trade Increasingly Affec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kyo: JETRO.
- Kang, I-Chi (1997), "Japanese Auto Parts Industry--New Challenge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Created in Southeast Asia," <<http://www.cetra.org.tw/mars/mkrpt/jpnauto.htm>>.
- Keizai Koho Center (2002) *Japan 2003: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okyo: Japan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 Kojima, Kiyoshi (2000),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 4, 375-401.
- Korhonen, Pekka (1994), "The Theory of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1: 1, 93-108.
- Kwan, C. H. (1994),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Towards*

- a Yen Blo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wan, C. H. (2002),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s Flying-Gees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S Import Statistic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2-E-009*, <<http://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dp/02e009.pdf>>.
- Morishima, Michio (1982),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Noble, Gregory (1996), "Trojan Horse or Boomerang?—Two-Tiered Investment in the Asian Auto Complex," *The BRIE Working Paper*, <<http://brie.berkeley.edu/BRIE/pubs/wp/wp90.html>>.
- Ohta, Hideaki, Akihiro Tokuno, and Ritsuko Takeuchi (1995), "Evolving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Japanese Firms in Asia," in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s.), *The New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3-63.
- Ozawa, Terutomo (1999),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in Alan M. Rugman and Gavin Boyd, (eds.), *Deepening Integration in the Pacific Economies*, 55-90,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Ozawa, Terutomo (2001), "The 'Hidden' Side of the 'Flying Geese' Catch-up Model: Japan's Dirigiste Institutional Setup and a Deepening Financial Moras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2: 4, 471-491.
- Rose, Andrew (1997), "Dynamic Measures of Competitiveness: Are the Geese Still Flying in Formation?" *FRBSF Economic Letter*, 97: 17, 1-3.
- Sikorski, Douglas and Thomas Menkhoff (2000),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Asian Business,"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22: 1, 1-17.
- So, Alvin and Stephen W. K. Chiu (1995),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Tabb, William K. (1994),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the Asian Geese," *Monthly Review*, 45: 10, 29-40.
- Thirlwell, Mark (2002), "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Emerging Asia Riskwatch*, 6, <<http://www.asialine.dfat.gov.au/asialine/asialine.nsf/c8ee8f4a56abe126ca256b0c000b2a6b/71b523ee26e131b0ca256c1e00259409?OpenDocument>>.
- Tsui-Auch, Lai-Si (1999), "Regional Production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mental Impa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Production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3: 2, 345-359.
- UNCTAD (199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 Vernon, Raymond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2, 190-207.
- Vernon, Raymond (1979), "The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1: 4, 255-269.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de, Robert (2000), "Wheels Within Wheels: Rethinking the Asian Crisis and the Asian Model,"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85-115.
- Wang, Chia-Huang (1999), "Flying Together?—Taiwan and the Flying Geese Developmental Mode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